

论儒家社会治理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寇梦瑶

武汉科技大学, 湖北 武汉

收稿日期: 2022年7月5日; 录用日期: 2022年7月24日; 发布日期: 2022年8月5日

摘要

一个社会没有了治理如同一盘散沙, 社会治理思想对实现国家社会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指导意义。儒学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构成, 其蕴含的社会治理思想, 对当今的社会治理仍有重要的社会价值。通过研究不同历史阶段儒学所蕴含的社会治理思想, 探究其深层意义、吸收其精华。并将经过历史考验的社会治理思想, 应用于现代社会的治理, 从而进一步推动社会治理制度更加完善、社会更加和谐进步。

关键词

儒学, 社会治理, 启示, 价值

On the Modern Value of Confucian Social Governance Thought

Mengyao Kou

Wuh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uhan Hubei

Received: Jul. 5th, 2022; accepted: Jul. 24th, 2022; published: Aug. 5th, 2022

Abstract

A society without governance is like scattered sand, and the idea of social governance has guiding significance for realiz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national soci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bilities. A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traditional culture, Confucianism contains social governance ideas that still have important social value for today's social governance. Through the study of the social governance ideas contained in Confucianism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stages, we can explore its deeper meaning and absorb its essence. And the social governance ideas that have been tested by history will be applied to the governance of modern society, so as to further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the soci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the more harmonious progress of the

society.

Keywords

Confucianism, Social Governance, Enlightenment, Value

Copyright © 2022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前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获得多方面重大成就。无论是经济社会还是人民的生活水平都得到了跨越式的进步。为了更好地服务于人民,应该完善社会公共服务体系,把重心放在社会治理之上。而社会治理是公共服务体系中举足轻重的部分,具有重要的价值意义。习近平总书记表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历史悠久、丰富璀璨,有许多需要我们学习传承的内容。儒学所蕴含的社会治理思想至今仍具有重大的社会价值。对儒学中社会治理思想的探究,有助于我们从历史的角度和发展的态度看待过去治国理政的思想方法。儒家思想的深入研究是当今社会管理的重要思想来源之一,具有显要意义。[1]中国传统文化经久不衰,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儒学思想在历史进程中不断地吸收其他优秀成果,铸就了庞大的理论体系。任何实践都需要理论的指导,需要把儒学中的社会治理思想与当今社会实际相结合,从而探究最适合的科学理论,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的构建。对儒学中社会治理思想的研究,对现代社会治理仍有启示意义。

2. 不同阶段的儒家思想所包含的社会治理思想

(一) 春秋战国时期强调“仁政”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周王室的逐渐衰退,各个大国开始争夺政权。形成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局面,不同层次的阶级领导人开始了自己的治国学说和社会主张,加之当时各个流派的思想家崛起,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

儒家思想提倡礼乐制度,孔子强调“天下无道,礼乐崩坏”,在一个国家治理当中要注重礼仪道德和等级制度。孔子提倡每个人的言行举止都要符合于理的规定,表示社会要以和为贵,有效地维护社会稳定秩序。维护好社会的秩序,可以让不同的人更好的各司其职,发挥自己的才能。孔子提出以德治国,包含着丰富的社会治理内容,促进了我国思想和文化的发展。[2]

后来儒学分为了八派,孟子传承了孔子的儒学思想,并结合当下社会治理形成了“仁政”。[3]后来荀子进一步继承和发展儒学,成为了新儒学的奠基人,使儒学的发展更加符合封建社会的治理,对后续社会治理的发展具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二) 汉代推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汉代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用儒学的思想来服务于国家中央集权的统一。董仲舒为儒家学说贴上了“三纲五常”“大一统”“君权神授”等标签,为的是进一步说明其封建统治的合理。[4]

(三) 宋明时期的交融与创新

宋明时期,儒学吸收了佛教的思想,编成为程朱理学。随后陆九渊、王守仁对佛教的思想进行了批判,并以儒学为根基,结合自身思想观点发展成为心学。而程朱理学的核心思想是“理”先于天而存在

和“格物致知”论。讲求从探究事物之中得到真理，是程朱理学格物致知的关键所在。而心学长期居于统治地位，当时备受重视。

3. 儒家社会治理思想的主要内容

中国传统文化中，很多学派对社会治理做了相关论述。^[5] 儒学思想所蕴含的社会治理思想主要包括：“仁”和“仁爱”、“德治”和“礼治”结合、“经世致用”思想和常备“忧患”意识：

(一) “仁”、“仁政”

世人称孔子的思想为“仁”的思想，孔子认为“仁”是最高的道德规范。孔子的生平里无论是教书育人、治学为人，都始终奉行“仁”的思想。形成了以“仁”为核心的庞大的道德伦理思想系统，人要有高尚的道德，凡事以“仁”为先。毫不做违反道德的事情，必要之时牺牲自我成全这一事业。

孔子说：“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6] 统治与管理的核心为人，治理国家的根本在于树立道德之仁。仁政的不仅将通过维护社会秩序来保证国祥民安。它在治理社会秩序和维护公共利益的同时，把仁义融入到人民的内心^[7]。”

(二) “德治”、“礼治”

德治是通过用道德约束人们的行为，使人们的行为达到一定的规范，从而是社会更加和谐稳定。《论语·为政篇》中说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7] 孔子认为统治者以身作则、修身养性，作为优秀到的表率，是全民道德更上一层楼；另一方面，从教育入手培养人们良好的道德素质，从根本上改变人们的道德观念，使人民名礼义廉耻；非暴力的方式去教导人民，道德的感化在无形之中提升着全民素质，稳定着社会治理。

“礼”在中国社会上表现为典章制度和道德规范，在社会环境变化的情况下，在“礼”的思想中加入了“仁”，使“礼”有了具体的道德标准。“礼治”的载体是“礼制”，所谓“礼制”，指的是国家规定的礼法。^[8] 通过礼制达到社会秩序井然有序，国家治理进一步完善。“礼治”和“德治”一样是通过提高人民的道德素质，将社会的道德规范形成人们自身的行为规范，从而达到人民安居、社会和谐稳定的目的。

(三) “经世致用”思想

经世致用是明清时期一种重要的研学方法，倡导做学问要有利于解决国家问题，有利于促进国家事业的发展。儒家经世致用思想是根据现实问题，提出合理的方法解决矛盾。“经世致用”思想要求人们做到结合当下之事，勇于创新、注重研究。^[9]

(四) 具备“忧患意识”

忧患一词最早出现于《周易》，而忧患意识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显著的特点。在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争霸，面对乱世，提出解决政治现实问题要具备忧患意识。孔子认为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把忧患的重点放在关注他人、社会和国家层面。孟子认为“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懂得具备忧患意思走的更长远，安居享乐以使人趋向死亡。

4. 儒家社会治理思想的当代启示

儒家的社会治理思想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其价值是经过历史验证的真理，为当今的社会治理提供了很有启示：

(一) 把“仁政”思想融入社会治理

儒家思想的逻辑起点是性善论，孔子认为“仁”是最高的道德标准。所以一个国家的社会治理，上到国家管理人士，下到基层人员都要习善，要通过人人向善达到社会秩序井然有序，社会更加和谐。而

“仁政”是强调关注人的内心世界，社会治理不能只关注表面，要深入到内部。治理人民的内心至关重要，引导全民习善，学习用最高的道德标准来约束自己。全民素质的提高有助于社会精神文明发展、有助于增加社会向心力，从而达到社会秩序井然有序、社会治理步步高升。

(二) “德治”和“法治”相结合

当前，全面推进法治，是结合人民的意愿和社会发展的规律，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对于社会治理来说，“法治”是必不可少的，“德治”也是不可或缺的治理方式。儒家社会治理强调多元治理，是礼治、德治、仁治、法治的综合运用。道德和法律密不可分，是社会治理体系构建的一部分，也是规范人们行为的重要方法。法律是书面的道德，道德是内在的法律，具有不同的特点和侧重点。因此，社会治理需要德治与法治相结合，这样才能面面俱到。法律制度是一种硬性的规范，是禁止而不可为的；道德是引人向善、改变社会整体面貌、形成良好社会风气。当前，社会治理应坚持法治与德治的统一。只有多元治理，才能面面俱到、对症下药，有针对性的解决社会治理中的重点、难点。

(三) 社会治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儒家的社会治理思想继承了殷周时期“民为国本”的思想，人民乃国家之根本，社会治理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10]社会治理的最终目标是为人民服务，是人民过上满意的生活。

社会治理的是为了稳定社会秩序，建立良好的社会公共服务体系。社会治理是需要全民去共同参与、共同构筑，依靠群众的力量，共同维护社会治理体系。只有从人民的角度出发构筑的社会治理体系，才能更加的鲜活、有生命力。^[11]习总书记说，一切工作的检验标准，都是看人民的生活是否有保障、是否幸福。人民群众真的得到了实惠，人民生活真的得到改善，人民权益真正得到保障，社会整体幸福感才会去提升。整个社会的幸福感提升，社会矛盾数量也会相对减少，人民才真正的成为国家的主人。

(四) 把“经世致用”的思想融入当今社会治理

“经世致用”的思想是讲求做学问、探究真理是为了解决社会问题，推动国家各项事业的发展。把“经世致用”的思想融入到社会治理当中，有利于我们社会治理体系的建设更加精准。社会治理不应该只注重已经发展得不错的领域，而是要在突出问题的领域下足够的功夫，做足够的学问，解决社会治理薄弱环节的问题。社会治理建构的每一小步骤，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相关领域的学术研究者所做的研究是有现实价值意义的，值得考究的、服务于社会的。只有学术界、政府等所做的有关于社会治理的努力，都是报以经世致用的态度，所做出的决策、努力，才是有效的、有价值的，社会在高效的社会治理体系下越来越好。

(五) 具备“忧患意识”和“底线思维”

忧患意识指一个人不过分关注自己，超脱自己去关注国家的命运。从而拥有改变改变不好的结局，和战胜困境的决心和勇气。^[12]无论是社会还是个人，不能只是贪图享乐，要具备忧患意识。任何政策的构建，都是在摸石头过河，要有忧患意识，应对社会治理中出现的问题。忧患意识更多的是一种责任，更是一种担当。只有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才能更好的面对重大问题的出现，以最佳的方式处理问题。

5. 总结

儒家思想中的社会治理思想，对于维护社会的稳定，封建政权的巩固以及化解社会矛盾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儒学所蕴含的社会治理思想，对当今社会依然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我们要积极继承儒学思想中关于社会治理的重要思想，继承发展、与时俱进，推动我国社会治理制度更加完善，社会治理能力和水平进一步提高。从而实现社会治理能力和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实现人民安居乐业、国家繁荣兴盛、社会和谐稳定。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在中国大地上探寻适合自己的道路和办法[Z]. 中国党政干部论坛, 2014-11-06.
- [2] 李秀东. 儒家思想对现代社会治理的启迪[J]. 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 41(4): 153-156.
- [3] 袁卫. 中国传统社会治理思想的现代转化——在“国际儒学论坛·2010”开幕式上的致辞[C]//2010 国际儒学论坛论文集.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 2010: 3-4.
- [4] 李红兄. 简析中国传统文化——儒家思想的演变过程及地位[J]. 中国校外教育(美术), 2012(12): 16.
- [5] 魏礼群. 习近平社会治理思想研究[J]. 中国高校社会科学, 2018(4): 28-30.
- [6] 杜云, 杨明. 仁道、仁人、仁政——孔子仁学的三重意涵[J]. 伦理学研究, 2017(1): 23-29.
- [7] 杨伯峻. 论语译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7.
- [8] 黄春春. 孔子礼学思想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 2019.
- [9] 金丹. “善治”: 儒家伦理思想的现代治理意义[J]. 山东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5(1): 107-108+162.
- [10] 高斌. 中国传统文化中社会治理思想的梳理与启示[J]. 知与行, 2019(3): 65-69.
- [11] 高斌, 郭鸿炜. 习近平社会治理论述解析[J]. 攀登, 2019, 38(3): 25-31.
- [12] 李庆杨, 刘晓鸥. 国外爱国主义教育及其对我国的启示[J]. 沈阳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 14(3): 67-69.